

“有工没人做”背后的四个问题

编者按:老板挑工人变成工人挑老板,还不是最让人头痛、最应该担心的,最头痛、最应该让人担心的是,许多农民工二代、农三代患上了“三高三低”的毛病——学高技低、眼高手低、心高志低。

许多农二代农三代拿着大学大专文凭,却做什么什么不会,又不能吃苦,心气儿还高,想法挺多,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尽快解决,不但人口数量红利转质量红利的设计会落空,危害或将远不止此。

人口红利,是我国从2001年加入世贸之后,推动经济增长近20年的最大动力源。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支撑起了全球最大基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并生产出了全球20%的最终消费品。人口红利耗尽,农民工整体丧失增长性,乃是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的麻烦,没有之一。

从2008年底开始,国家统计局就会每年开展一次全国性的农民工抽样调查,并发布调查公报,随便将这些数据加以整理,就不难发现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大趋势:

第一,农民工群体正在无可逆转地老去。2008年我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是34岁,到2020年,已经达到41.4岁。按这种整体老化速度,到2025年,我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就会超过45岁。指望一群中老年人继续维持中国基础制造业大国地位?这绝无可能。

事实上,以上我国农民工群体平均年龄数据,表现出来的恰恰就是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趋势。

当核心劳动力群体的平均年龄超过40岁之后,所谓的人口福利,已经被消耗干净了。更麻烦的是,这群2.8亿正在老去的农民工,并没有任何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他们之所以出来打工,无非就是因为他们在乡下的田地,其实根本就无法提供足够的收入养活他们。所以,不久的将来,最快在5年以内,我国将会赫然面对数以亿计的老无所依的打工仔,他们年华老去,没有了力气可以卖,找不到新工作,又享受不到养老福利,所以他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想好了吗?这件事列入我们的顶层设计了吗?

第二,农民工正加速从制造业逃逸。从事制造业的我国农民工数量在2016年达到峰值的8761万人,此后就进入了坚定的下降通道,到2020年已经下降到7797万人,四年时间的降幅11.0%。这大致是由于我国的基础制造业面临地产泡沫的冲击,彻底丧失了增长性。不过,有趣的是,地产泡沫的扩张并没有带来建筑业就业人数的增长。从

事建筑业业的农民工在2015年达到峰值的6188万人,到2020年萎缩到5226万人,五年时间降幅达到15.5%,比制造业降幅还大。对此,可能的解释恐怕是:农民工整体越来越老,能够承受工地上上的强体力劳动的农民工数量整体减少,同时日益兴起的快递和外卖行业又吸纳更多了年轻农民工,每天骑着电瓶车接单送单总比进工地灌水泥扛钢筋来得舒服,所以中国虽然遍地都是住宅小区的建筑工地,但建筑业已经丧失了吸纳新生代农民工的能力。

第三,农民工学历越来越高,眼高手低问题越来越突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人数,从有数据的2011年的1340万人(占农民工总数比值5.3%),到2020年已经增加到了3484万人(占比12.2%)。这组数据好玩就好玩在,它揭示了一个很冷酷的现实:农村出身的大专生的出路问题,也就是基本没有出路,大部分还是只能去做农民工。

单看2020年,大专以上学历农民工人数3484万,较2019年的3228万,增加了256万。这256万,当然就是当年度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实在是找不到进写字楼的光鲜工作,于是进厂下矿,或者骑上电动车,做快递送外卖——这样的简单劳动,本质上与他们的父母辈并无任何不同。256万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转身干起了农民工,这是什么概念呢?2020年我国大学毕业生总数为797万,考虑到我国近年来的户籍人口按城乡分,大致是四六开,那么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人数约为478万,其中256万当农民工去了,占比53.6%,超过一半。当然了,统计局的数据没有区分本专科,如果单看专科的话,相信比例一定会更高,相信总数不会少于七成。所以农村子弟读专科医院,真的不如读个技术学校,好好的考个电工钳工技能等级,反正毕业都是做农民工,真真正正考个技能等级证书的话,工资轻轻松松也能上万。

(摘自《投资决策参考》)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就在身边

企业核心价值观



Yuan quan

2021年7月22日
第二十九期
总第532期

主办: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供水排水公司 网址:www.gxqgps.com 准印证号:冀L1100242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向“改革老人”高尚全致敬

编者按:中国经济改革是“改革老人”高尚全一生的追求和牵挂。他多次参与我国重大经济改革决定的制订,为改革开放鼓与呼,有力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和改革理论的

发展。从他的人生经历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改革几十年来的巨大发展变化,今天我们深切缅怀高老,同时也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充满信心 and 希望。

据新华社报道,6月27日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官网发布讣告称,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世界银行高级顾问等职。改革开放以来,高尚全共参加了六次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一次是十五大报告,两次是中央关于五年计划的建议,三次是三个中中全会的决定,即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

会前,他又两次向中央提出建议,都涉及改革的核心议题。高尚全出生于1929年,1979年我国开启经济改革,这也开启了他人生的春天。他曾被调往新成立的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开始有机会真正研究经济问题,对我国重工业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建议。1982年高尚全被调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体改委不同于一般的部委,它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规划设计院”。从“十二大”到

“十五大”之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有国家体改委的参与。中观领域的金融体制改革、流通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以及微观领域的现代公司制度改革,也是体改委主导参与的。1985年,高尚全开始担任体改委副主任,成为体改委领导之一,这期间他对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流通体制改革都做出了全方位的贡献。他还发挥了英语好、理论功底深的特长,多次代表体改委进行对

我和中国经济改革的故事

编者按:《源泉》为各位读者推荐高尚全同志的文章,是要表达我们对这位改革功臣的怀念之情与敬仰之心。高老是他所讲的几乎所有故事的主人翁,每个故事都是他的一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的真实记录。从这些故事中,我们能读出作为一位共产党人的高老对

党对人民对国家民族的赤胆忠心,能感受到高老敢于突破思想牢笼、体制藩篱进行理论探索创新的勇气和善于在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提改革建言的智慧。这些故事,也从一个侧面真实地记录了我国改革开放既波

澜壮阔又循序渐进的历史进程。

高老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世界银行高级顾问等职,先后参加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等6次中央重要会议文件起草工作。他关于“企业自主权”“商品经济”“劳动力市场”等一系列改革建言,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改革理论的发展。201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高尚全曾接受“政事儿”专访。他说,“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但是改革仍是我最重要的工作。每个工作日的上午我都会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办公室工作,思考改革的问题,撰写改革的著述。”对这位数十年来始终勇立

改革开放潮头、心心念念都在不断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探索者的最好的缅怀最高的尊敬,就是学习他的品格、传播他的理念、赓续他的精神、继承他的遗志,把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在怀疑改革开放、否定市场经济的危险倾向已经出现的当下,我们更有必要向高老学习。在刚刚结束的我党百年华诞的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言犹在耳,我们要不忘初心,坚定践行,顺应滚滚历史洪流。

一、关于企业自主权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1956年发生的。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一篇文章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当时用了一定的自主权,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有点保守了。企业应该要有完全的自主权,但是在当时提出一定的自主权,也是非常不容易。当时为什么考虑要写这个文章呢?计划经济体制它的弊病不是现在才暴露出来,在1956年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了。当时因为传统的经济体制,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政府就得统管。

二、“广东人吃鱼的故事”。

广东人爱吃鱼,但是搞了计划经济就很少吃鱼了,为什么?因为计划经济是统制经济,价格管死了,养鱼的人没有积极性了,因此鱼就少了。后来价格逐步放开了,养鱼的人有积极性了,鱼多起来了。这个例子说明,不搞商品经济是不行的。

三、关于南、南改革考察的故事。为了制定1987年1988年改革方案做准备,我带了18个人的代表团去匈、南深入考察。我们重点考察了匈牙利、南斯拉夫两国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的摩擦、矛盾问题、发展趋势和解决问题的方向。分别与两国领导人、党政有关部门负责人、著名学者、学术研究机构和企业界人员座谈100多次,形成座谈纪要30多万字。考察结果,形成了《关于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的考察报告》。1986年6月26日我向国务院主要领导汇报了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对我国的启示,这次考察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充分重视和肯定。

四、关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故事。1993年11月,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容易,是重大的突破。我负责《决定》中市场体系部分的起草工作。1993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修改稿。我作为市场体系分组组长,有幸列席了会议。本来这样的会议轮不到我发言,但是我当时憋不住了,因为如果不站出来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肯定定不出来,一定是原稿上的“劳动就业市场”。所以我鼓足勇气举手发了言。后来,劳动力市场就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五、关于一般和特殊关系的故事。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来,我们的改革目标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两种不同理解:它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

场经济,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它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可以不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般,社会主义条件是特殊。”价值规律,竞争规律,都是一样的,不能因为搞社会主义就不一样了。一般规律是人类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共同价值、理念和经验,是人类的文明成果。我们不同的就是我们的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六、关于自由和人权的故事。1997年,参加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时,我是负责所有制部分。我看到别的同志负责的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没有写自由,也没有写人权,所以在起草小组大会上我就提出,必须要把“自由”和“人权”写进去。当时讲了三条理由:第一,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问一下自己,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权? (下转第二版)

本版责任编辑:刘彦芳

深圳政策大礼包中最值钱的是什么

编者按:国家发改委下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清单》,深圳迎来重大政策利好,外界将其解读为党中央给深圳四十年的“生日大礼包”。改革清单包括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科技创新体制、对外开放、

公共服务体制、生态和城市空间治理六个方面。这个大礼包,有很多令其他城市艳羡的自主权,但背后则是更大的责任赋予和对担当的要求。深圳要运用政策工具,充分发挥政策优势,担当新时代历史使命,立起深圳标杆,再立改革新功。

据新华社报道 10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文件明确了深圳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细化了在要素市场化、高水平开放、科技创新、城市治理等领域的自主探索方案。该方案增强了资本市场对创新创业企业的服务能力,能更好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国家发展全局而言,将有利于为其他城市发展树立典范和标杆,形成各大大城市之间对标追赶、竞相发力的新格局;有利于推进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有利于更好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利于率先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路径和新方略。从高科技产业发展角度看,深圳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个旗帜。创业板上市企业多为高科技企业和民营企业。目前,深圳本地创业板上市企业近百家,占比近12%,深圳创业板上市企业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处于领先地位,而这又是深圳经济最具活力的部分。从融资角度看,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有助于进一步降低科创

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门槛,推动更多优质企业多元化融资,有力推动深圳将科技优势与金融结合,使深圳的科技创新优势进一步放大并充分发挥,加快深圳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的前进步伐。从房地产角度看,此次土地管理“扩权”或有助于深圳增加住房建设供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利于土地供需矛盾缓解,存量用地更新、土地转性等加速,同时系列措施有望推动深圳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保障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从土地统筹空间看,深圳获得了更大的土地管理权,而深圳作为一座创新科技之城,是由无数个小型企业慢慢发展起来的,通过大量供应降低企业租赁成本,可以避免企业外流,同时鼓励企业做大。有了充足的工业用地保障,大力发展高科技,才能促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实现持续的转型升级。深圳要以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为契机,在着眼于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的过程中立起深圳标杆,打造特区特色,再立改革新功。

【主持者言】近日国家发改委

委下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清单》,全文共40条,同时,国务院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这意味着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深圳迎来重大政策利好,外界将其解读为党中央给深圳四十年的“生日大礼包”。从改革清单来看,内容非常具体,这40条授权事项包括六个方面,其中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14条,营商环境方面7条,科技创新体制方面6条,对外开放方面7条,公共服务体制方面3条,生态和城市空间治理方面3条,各条中明确了改革事项的主要内容。这是党中央首次为了一座城市量身订做了新时代的改革总纲领,同时也是首次采取“实施方案+授权清单”滚动推进的全新方式授权改革,首次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地方在重要领域和关键改革环节上有更多的自主权。从总体上来看中央给予深圳的相关政策力度比海南“自贸岛”更大,尤其是提出了在法律方面做更多授权,鼓励深圳在新经济领域加快一些立法创新。源于篇幅限制,主持者着重分析清单中的三点:首先是

(摘自2020年第41期《投资信息》)

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初心”绝不能忘

编者按:在改革开放中成就“四个伟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精神的伟大体现。坚持改革开放的“初心”,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和践行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解放思想,

时刻防范“四个危险”,克服小农意识,警惕封闭僵化、自以为是思想抬头,以开放包容、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姿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用实际行动去感悟、参与、见证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国上下正以前所未有的隆重仪式庆祝党的生日。诞生百年而依然存在的政党在世界政治史上并不少见,但诞生百年而依然壮大、执政 72 年还依然强盛的政党,在世界历史上则并不多见!

对比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的命运让人感慨。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党,但苏共并没有延续下去。从 1917 年 4 月 24 日成立到 1991 年 11 月 6 日苏联解体后解散,苏共的存在时间为 74 年。这 74 年中,苏联经历了一个从生到死的轮回——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到反法西斯大国,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带头大哥”到帝国,再从帝国转向崩溃和解体。“冷战”的历史背景是重要的外在原因,苏联自身的问题则是更重要的内部原因。

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选择并走过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从而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结果。在发展道路选择上,中国与苏联

最大的不同在于,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中国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告别了不正确的过去——中国选择了追求吃饱穿暖、改善民生,告别了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政治内斗;选择了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告别了狭隘闭塞和固步自封;选择了拥抱市场经济,告别了效率低下的计划体制;选择了以开放心态学习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与知识,告别了夜郎自大的闭关锁国;选择了尊重常识和实事求是,告别了凡事上纲上线的政治浮夸。

中国之所以能选择不同的道路,给予十多亿中国人带来不同的命运,源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核心领导层的睿智选择,也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选择,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勇于改错、勇于学习、勇于自我改革的特点,从而使这个党保持了生命力和韧性。最重要的是,在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的道路时,把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初心。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我们党近

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正是由于始终坚守这个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才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如果“忘记初心和使命,我们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

回头看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可以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当代中国发展所依赖的“初心”,是实现“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这一终极目标的正确道路。从改革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谈不忘初心,就是不能忘记改革开放。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显示,中国得从一个贫穷落后的计划经济国家,发展为全球经济规模第二的经济大国,正是得益于坚持改革开放。在我们看来,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在追求“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也使中国共产党创造出了新

的成绩。对比苏联共产党的命运,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它使得执政党与中国国家和人民的发展紧密相连,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既然走对了路,未来的中国要继续发展,就应该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这既是中国改变自己命运的“初心”,也是今后中国发展的航向。有人说,中国当前和今后发展的国际环境与过去不同,四十多年前的美苏“冷战”背景下,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欢迎和开放的,而今的西方世界则带着新“冷战”眼光,不同的是,这一次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中国。但在我们看来,即使如此,中国仍然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战略,中国过去改变命运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未来的发展和复兴之路仍然系于全球化。不论是“国内大循环”还是“国内国际双循环”,都与改革开放这一大方向是一致的。

在新的地缘政治时代,在已

经取得显著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中国需要警惕一种倾向,即中国可以不再改革开放,甚至认为中国可以关起门来自己搞发展,这种看法很容易在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不好的时候影响和干预决策,甚至影响中国的政策。我们应该意识到,现在的发展成就正是过去改革开放的结果,如果不再坚持改革开放,未来中国的发展将面临不再开放带来的损失。6 月 27 日去世的中国体制改革“老兵”高尚全,在晚年就曾担心:“如果年轻人对封闭僵化的老路没有足够的警惕,甚至把它当作解决前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的办法,中国的改革事业就会遭受重大的挫折甚至走回头路”。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既有历经苦难辉煌的建国之路,又有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腾飞之路。中国未来的发展命运,依然在很大程度上系于中国是否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初心”。

(摘自 2021 年 7 月 2 日《要情参阅》)

编者按: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包括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两大方面。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的推进,绿色发展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在社

会总消费中的作用也日益彰显。如何深入理解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抓住消费建设的机遇,创新发展消费理念,会成为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的重要抓手。内需不足的问题在于消费需求不足,消费不足是因为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相对较低。居民收入较低又主要在于劳动这一要素的报酬相对较低,在 GDP 中的份额相对较低。中国 GDP 总量居世界第二早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了,但劳动报酬从而居民收入以至其消费水平却并非与这个地位十分相称,而这种不相称也不是由人口多就能作出全部解释的。要提高人民的

获得感是一个明确宣示的目标,但这并不仅仅是获得“感”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人民的“获得”能够实际提高的问题。如果劳动市场有更为市场化的发展,如果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的改革有更显著的推进,如果由垄断、特权等因素造成的分配不公能得到切实的减轻,如果政府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民生用于社会保障,如此等等,那么人民的收入水平

九、关于“三个民”的故事。**“三个民”,就是民心、民生、民意。在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时候,我在起草小组大会上做了一个发言,主要讲了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我不赞成把国有企业定位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我于 2013 年 5 月,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党的十八大的三点建议》,一、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党的执政基础在于三个民(民心、民生、民意);三、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十、关于十三届三中全会两次建议的故事。有人问我,你那

么高龄了,对改革还操心干什么?我觉得改革是无止境的任务,思考改革、参与改革这是我的责任,尤其是当改革碰到困惑的时候,更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过去中央做出的综合改革都是每十年一次。2003 年到现在也是十年了,中央应当做出决定的时候,我给中央提出两次建议,第一次建议有三个内容:一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名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二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 and 突破口,三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建议主要有两点:一是发挥智库的作用,二是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参与与的积极性。(摘自 2021 年

(摘自 2020 年第 41 期《特供信息》)

用户放心满意 个人心情舒畅 企业兴旺发达 家庭幸福美满

企业价值观

内卷化:一个值得探讨的新概念

编者按:“内卷化”,是变相的、更加隐蔽的、危害性更大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一种虚化了的“努力”,一种标榜“严格执行、深入落实”的积极的抗命。貌似言听计从,实则矫枉过正,貌似开拓创新,实则

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貌似集思广益,实则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貌似谋求发展,实则进行着毫无意义的内耗。华而不实是内卷,阳奉阴违也是内卷。概括起来说,所有无实质意义的消耗都可以称为内卷。内卷会使社会或文化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便停滞不前。对于企业来说,若任由内卷泛滥,则后患无穷。

据今日头条 内卷 involution,与之对应的是 evolution,即演化。直观地说,内卷就是“向内演化,或绕圈圈”。更宽泛一点说,所有无实质意义的消耗都可称为内卷。生活中许许多多低水平重复的工作,貌似精益求精,大家都按部就班,埋头苦干,乐此不疲,但只有在有限的内部范围施展,不向外扩张,工作方向是向内收敛的,而不是向外发散的,这就叫内卷。试以七个大家熟悉的事例来作解释。

1. 无意义的精益求精是内卷。例如,有些单位为落实上级领导决定的项目,又要冠冕堂皇使整个决策过程看起来科学化,以应付审计和巡查,为此,大费周折,搞了一套又一套的可研报告,邀请了一批又一批的专家学者提意见和建议,开了一次又一次的评审论证会,穷折腾一番,其实项目早就由领导拍板决定了,这些庞大繁忙的工作,费钱费时又费力,把简单问题搞得复杂,目的只是补程序,把所谓决策科学化的圆圈画完,这就是一种内卷。

2. 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是内卷。例如,有些单位为落实上级领导决定的项目,又要冠冕堂皇使整个决策过程看起来科学化,以应付审计和巡查,为此,大费周折,搞了一套又一套的可研报告,邀请了一批又一批的专家学者提意见和建议,开了一次又一次的评审论证会,穷折腾一番,其实项目早就由领导拍板决定了,这些庞大繁忙的工作,费钱费时又费力,把简单问题搞得复杂,目的只是补程序,把所谓决策科学化的圆圈画完,这就是一种内卷。

3. 为了免责,被动的应付工作也是内卷。每逢重大节日或敏感时期的前几天,下级机构必须响应上级号召,组织大规模的安全生产(或维稳之类)大检查。大家都明白,大部分领导可能连安全生产的资质证书也没有,这些检查未必有什么实际效果,但还得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完成这个固定动作,以期万一出了事可以免责,这也是一种内卷。

4. 与预期的目标严重偏离的工作也是内卷。社会上许许多多的创建评比就是内卷。因为这些评比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不能借助这些评比大赛来推动其预期的工作,无法实现其初衷,做秀成分多于实质效果。例如,某某创业之星大赛,又或某省几个部门联合搞的科技创新先锋大赛等等,事实上,个人不会因大赛才去创业,科技企业也不会因为大赛才搞科技创新。大赛的初衷是推动个人创业和科技创新,但实际作用却微乎其微,这种大赛当然是内卷。

5. 低水平的模仿和复制是典型的内卷。微雕和微刻只是形式上的艺术,其创作内容只会少于正常尺寸的艺术品,尤其在着色方面,微雕微刻受到致命的限制,微雕微刻的艺术内涵不可能超越正常的艺术创作。这种刻意的微化就是一种内卷。这是一种自我较劲,一种乐在其中的自讨苦吃,花费了大量时间,耗尽了意志力,但没有创造出新内容,还得拿个放大镜看,累死人。

6. 限制创造力的内部竞争

是制度性的内卷。例如,僵化的考试制度严重限制了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成长的空间。学生为了考取高分而被迫在教学大纲范围内下苦功夫,限制了学生自由的灵性,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同时,为了比出高下,出题人只好把考试题目出得离奇古怪,比如某某起义谁开了第一枪,谁开了第二枪,谁开了第三枪等等无聊之极的考题,这就是内卷。

7. 在同一个问题上无休止地挖掘研究是内卷。中国人对很多历史名著的研究让人咋舌,就这么几本书,一两百年来无数学者没完没了地去挖掘,你还能整出什么新东西来呢?但是研究仍在深入,精细还能再精细,没完没了。研究人员前赴后继,内容却不断重复炒作,论文抄来抄去,不断用曲解原著和牵强附会的佐证来标新立异,实际上都是那辆里的一堆烂肉,这是典型的内卷。

【主持者言】这段原文摘录,引自据说是华为公司内部论坛一篇最火最受共鸣的文章。很平常的文字和表达,何以会火会受共鸣?主持者猜想大半是因为文章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内卷化”,并作了七个方面通俗的解读。对“内卷化”这个新词,主持者不久前看到过,但不经意,更没有想到其巨大的概括力和重要性。于是,知其大概,不甚了了。现在,这个词在社会各层而火了,有通俗易懂的解释,也有做学问的深入探究,这让主持者想起上世

纪八十年代“异化”概念大讨论,想必一定都会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于是主持者也好奇,查询百度,翻阅资料,看到上百种有关“内卷化”的解释和例证,阅读了近二十篇相关“内卷化”的文章,竟然找不到“内卷化”的确切定义,和比较统一的解释。主持者苦思冥想,觉得这个学问挺大,难以统一给“内卷化”下定义,恐怕是因为这个概念的涵盖范围实在太广了。这篇华为内部文章列举了七种现象,都是典型的“内卷化”,但主持者特别想指出的是,当下人民群众痛恨的、党和政府也多次尖锐批评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对社会危害严重的“内卷化”现象。层层开会,层层发文,层层表态,就是没有行动,没有落实,不见成效;口号提花花样翻新,骨子里消极怠工;虚话假话能讨好,真话实话有风险;表象光鲜亮丽,实质危机四伏等等。

【主持者言】这段原文摘录,引自据说是华为公司内部论坛一篇最火最受共鸣的文章。很平常的文字和表达,何以会火会受共鸣?主持者猜想大半是因为文章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内卷化”,并作了七个方面通俗的解读。对“内卷化”这个新词,主持者不久前看到过,但不经意,更没有想到其巨大的概括力和重要性。于是,知其大概,不甚了了。现在,这个词在社会各层而火了,有通俗易懂的解释,也有做学问的深入探究,这让主持者想起上世

些都是指向旧计划经济的体制改革,而什么都叫改革,连修条马路整治一下环境卫生都叫改革,殊不知把改革泛化就没有改革了。更有甚者,某些“反向逆行”也冠以改革的美名,最典型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的所谓分税制“改革”。本来地方财政大包干是邓小平力推的“放权搞活”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其锋芒直指僵化的中央财政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调动地方大干快上的积极性十分明显。但是分税制“改革”把地方的税收收回,事权留下,打击了地方积极性,违背了改革的初心。又例如,现如今全国有十多个自由贸易区,数个改革开放试验新区,还有自贸岛、特区,但是,中央制定的顶层设计的利好政策都有钝化的趋向,难见落地开花。还有许许多多近年出现的对外开放的问题,似乎都可以用“内卷化”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所以,如何理解“内卷化”,主持者想到一架静止状态的飞机,由于晴空万里没有任何参照系,人们误以为它在高速飞翔,或者如江浙方言,把没有实际护家能力的笨犬称之为“芭篱狗”,这些形象的词叫,大概就是“内卷化”的涵义。如果硬要下一个抽象的定义,是否可以这样说:所谓“内卷化”,即事物发展的重要窗口期,以某种虚假的形式表现其对本源的停滞与反动。

(摘自 2020 年第 41 期《特供信息》)

(上接第一版)我相信如果不说假话的话都要,都要人权,都要自由。说假话是另外一回事。第二,《宪法》上提出要有这样或那样的自由,为什么十五大就不说呢?第三,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我们不要回避它。要老百姓继续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要继续执政,就必须把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

七、关于华为创新的故事。我在参加 15 大报告起草时,有人向中央写信说,华为科技公司姓“资”不姓“社”。主要理由是,华为公司是非公有制企业,而且搞了职工持股,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我认为,这是改革中必须弄清的重大问题,为此,我主动

要求到深圳实地作了调研。调研使我了解到,虽然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但华为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税收和财富,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职工分享了改革发展成果。这样好的企业,应该作为改革的典型,它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八、关于“陈奕光”的故事。山东诸城在大跃进时期建立的一批国有小企业不能适应市场需要,亏损严重。时任县委书记陈光下决心改革,采取改制出售的办法,以解脱困难。但当时就有人起来反对,给陈光带上“陈

奕光”的帽子。1992 年我应山东省委书记,省长的邀请给省级和厅级干部作一次改革报告,讲完后有一位同志提问:“你认为诸城的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我回答是,诸城的改革姓“资”还是姓“社”,判断的标准,只能按小平同志说的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我看到一个对 300 个诸城青年职工的问卷调查,问卷的题目是:“假如有人偷国家工厂的东西,你怎么办?”答案有三个选择:(1)与小偷作斗争;(2)装作看不见;(3)你偷我也偷,同卷回收的结果:选择与小偷作斗争的只有 14 人;选择装作看不见的 220 人;选择你偷我也偷的 66 人。这说明,这种企业财产的组织形式,职工并不关心。

九、关于“三个民”的故事。**“三个民”,就是民心、民生、民意。在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时候,我在起草小组大会上做了一个发言,主要讲了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我不赞成把国有企业定位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我于 2013 年 5 月,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党的十八大的三点建议》,一、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党的执政基础在于三个民(民心、民生、民意);三、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十、关于十三届三中全会两次建议的故事。有人问我,你那

(上接第一版)当时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已经出现很多危机,他们的考察成果让我国经济改革规避了很多风险。1987 年,他带领一些经济学家参加了世界银行在曼谷召开的“计划与市场研讨会”,这次会议可以看作是“巴山轮会议”的延续和补充,主要讨论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高尚全于 1993 年退休,但他对改革开放的贡献没有到此为止。让人感动的是,退休后,他依然老骥伏枥,继续为改革开放鼓与呼,多次参与重大经济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之一,“中国改革进程中推行市场经济的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跟很多改革派官员一样,高老改革的故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1982 年他进入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体改委),1985 年 5 月,高老担任了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严格意义上说,这个职位的行政级别并不算太高,但是高老在这个职位上所发挥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过了这个职位的行政级别。国家体改委是一个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规

划转型路径的机构,参与了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几乎所有重大经济体制改革决策过程,而这个机构最需要的,就是高老这种既了解市场运行机制,同时又深刻理解国情和党史,能够成为市场和政府沟通桥梁的人,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往往现实可操作性较强,体制内和体制外都能够接受,有利于切实推动改革进程。比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始终存在两个最具争议性、最重大的问题: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关系,而高老称得上中国最早提出并分析上述两个问题的政府高官,他曾先后参加 1984 年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 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等中央重要会议文件起草工作,将“商品经济”“劳动力市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等词句写进中央文件,而这些词句,也成为了不少民营企业在市场化运作中的“尚方宝剑”。高老当年作为华为公司仗义执言更是被传为佳话。1997

【主持者言】被称为“改革老人”的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高尚全于近日去世,对于主持者来说,这是一个曾经多次在经济教科书中和改革历史记录文献中看到过的名字。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和改革派官员,高老对于改革的主要贡献方式是通过建言

(摘自 2021 年第 24 期《特供信息》)

深圳奇迹:《春天的故事》重新奏响

编者按: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叠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很多人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将向何处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更

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革,深圳必须敢于担任先锋者、排头兵,承担起为改革开放先行探索的使命,再创深圳奇迹,重新奏响《春天的故事》,探索出一条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的新路径。

据新华社报道,10月14日上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春天的故事》那熟悉而深情的旋律在会场响起。6300多字的讲话,层次非常清晰:回顾深圳40年来实现的5个“历史性跨越”,总结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实践积累的10条宝贵经验,对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提出6点要求。从习近平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下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同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键时期”很好理解: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但是,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并不太平。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习近平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叠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从大局势着眼看到的一对矛盾,也是一个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很多人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将向何处去,各种风言风语也相伴而生。比如,国内外一些人妄言中国改革陷入停滞,质疑中国不是走向开放,而是越来越僵化封闭。前段

时间,还有人别有用心地宣扬国内大循环就是封闭内循环,甚至炒作闭关锁国等陈词滥调。这次,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期间说得非常明确:“我此行到广东考察,就是进一步向国内外宣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将继续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在庆祝大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同时,他还提到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这个表态厘清了一些认识误区,驳斥了种种荒谬言论。会后,习近平专程来到深圳莲花山公园向邓小平同志铜像敬献花篮。这同样是一次无声的宣示:中国会将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到底!改革不可能是小修小补,必须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没有现成路径可供参照,需要在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的合力中持续推进。所以,深圳必须敢于担任先锋者、排头兵,探索出一条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的新路径。

【主持者言】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于近日隆重举行,毫无疑问,这是今年的一场重头戏。回顾深圳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成长为今天举世瞩目国际化大都市的四十年,地区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7亿元增至2019年的2.7万亿元增长上万倍的发展历程,深

圳毫无疑问称得上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就连《经济学人》也曾对深圳不吝赞美:“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不过,这个奇迹并非偶然的爆发,而是老老实实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的结果,可以说,过去四十年的深圳既是奇迹,又是平常。最近不少人用“超级全球化”现象来解释深圳过去四十年的超高速增长,但是这个答案只能够回答让深圳具有如此强大增长动能的推动力是什么,而不能够回答为什么是深圳,而不是中国其他城市,也不是世界其他城市成为这个奇迹的创造者!在深圳四十年的之际,我们需要真正理解深圳的崛起之道,因为深圳同时也是整个改革开放历程的缩影,所以理解深圳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内核与精髓。首先,为什么是深圳,而不是其他中国城市?对于这个问题,主持者认为答案就是市场化、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时至今日,尽管深圳特区的政策已经不“特”,但深圳仍然是国内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这一点可以从深圳的

经济结构中得到佐证:无论是新登记企业数量还是个体工商户数量,深圳都在国内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按照人均创业密度来说,深圳连续多年排名全国第一,民营企业占全市企业总量的95%以上,同时,在城市对企业的吸引力和企业在城市的发展力两个方面,深圳都无可争议地位居全国首位。上榜《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的华为、腾讯、正威、恒大等深圳企业,都是民营企业,这种市场化程度让今天的深圳在国内仍然能够鹤立鸡群。其次,为什么是深圳,而不是全球其他城市?主持者认为,深圳的发展同时也离不开中国经济的纵深,深圳的背后是广袤的中国内地,是庞大的中国制造产业。深圳早期的发展大量获益于香港的资本流入和产业转移,由于地理发展空间有限,香港当年选择了专注于金融、咨询等高价值服务行业,并且把一些附加值相对较低的产业转移到了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城市,而深圳则在这些制造业之上又融入了创新,构建了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面向市场进行科研开发、技术交易和成果转化,较好地克服了科研机构游离于产业之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弊端。从“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时期,到以华强北为代表的模仿创新时期,再到创新科技之城的崛起,深圳逐步建立了新一代

(摘自2020年第41期《特供信息》)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内在逻辑

沿着这条“必由之路”,我们党带领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让改革开放的大潮在神州大地奏响激荡乐章

激发“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以扩大开放推进改革发展

1至4月,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4533家,同比增长50.2%,较2019年同期增长11.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970.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6%,较2019年同期增长30.1%……前不久,商务部公布了今年前4个月吸收外商相关情况。逆势上扬的数据,不断向好的态势,彰显了中国市场的独特魅力,体现了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积极成效。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2012年12月,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后首赴地方考察,便来到“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广东,发出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号召;6年后,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再赴广东考察,庄严宣告:“中国一定会有让

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沿着这条“必由之路”,我们党带领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让改革开放的大潮在神州大地奏响激荡乐章。改革开放已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品格。

历史的进程有多么波澜壮阔,它产生的影响就有多么广泛深远。1978年,面对“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响亮回答,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40多年来,从“有啥吃啥”到“吃啥有啥”,从“凭票购买”到“买遍全球”,我们通过改革开放,让这个曾经“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都成问题”的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40多年来,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我们依靠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来”,让这个

近代以来矢志伟大复兴的民族,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把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称为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并列为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如果说,当年的改革是“增量改革”,绝大多数人都能从中受益;那么,当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后,更多是利益调整 and 利益调整并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中流击水,奋楫者进;人到半山,唯勇者胜。从将全面深化改革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到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从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到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高举改革开放伟大旗帜,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站在建党百年的时间节点上回望,我们更能认清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如今,改革道路上仍面临着很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已经啃下了不少硬骨头,但还有许多硬骨头要啃,我们攻克了不少难关但还有许多难关要攻克。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

(摘自2021年5月28日《人民日报》)

铸好企业生存的锅 捏好自己吃饭的碗

企业创业观

源泉 2021年7月22日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般称为九月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开幕时作报告。

他在会上论述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以及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应该是怎样一个模样。

时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在会上发言提出,应该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攻坚与野战相结合。攻坚决必增援,造成野战的机会。”

后来的三大战役,正是攻坚与野战的结合。

九月会议之后,战略决战的序幕掀开了。

战机稍纵即逝

九月会议之前,1948年6月中旬至7月初,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进行了豫东战役,攻陷河南省会开封,然后在运动中消灭了增援的区寿年兵团以及黄百韬兵团一部,共9万余人。

这一战改变了中原战场的战略态势,开始了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的协同作战。

蒋介石更觉惨淡。“对军事前途顿生悲观,心神沉闷之至。茫茫前途,苍苍上帝,竟不知如何作为矣。”这是他的日记的原话。

九月会议之后,解放军先后在东北、华东、中原、华北和西北战场上,发起大规模的秋季攻势。华东野战军于9月24日攻克济南,俘虏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

解放军本来准备围城打援,以18万兵力严阵以待自徐州北援之敌,但徐州之敌竟未敢前进。

济南战役之后,山东除青岛等少数据点外,全获解放,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为一体,为解放军南下歼灭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创造了条件。

这是解放军攻克敌人重点设防的大城市的开始,毛泽东离开延安之前所说的“存人失地,地终可得”,在一年多之后开始应验。

蒋介石以大城市为主的“重点防御”体系,由此开始总崩溃。

制定“6个月消灭共匪”的作战计划的陈诚,此时也目标,在此以后,显然已成江河日下之势,狂澜既倒,无可挽回矣。

9月12日,九月会议结束前一天,为期4个多月的三大战役开始了。

当时,解放军数量上还少于国民党军队,装备上也不如对方。

叶剑英写道:“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人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

不能等到万事俱备了才行动,中共中央下了决战的决心。

此时决战,是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在解放军优势不断扩大时候,他仍舍不得放弃东北、华北,多支精锐部队还与解放军大牙交错在一起。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知道,这是稍纵即逝的战机,如果蒋介石

决定将部队往南线集结,就难以各个击破了。先打东北。

东北

国民党军队还有50万人在东北,包括战斗力很强的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他们占据着长春、沈阳、锦州这三个互不相连的大城市,日益补给困难,军心涣散,蒋介石正在研究是不是要放弃长春、沈阳,以巩固华北。

蒋介石更觉惨淡。“对军事前途顿生悲观,心神沉闷之至。茫茫前途,苍苍上帝,竟不知如何作为矣。”这是他的日记的原话。

确定了东北这一战略方向之后,战术上是先打北边的长春还是先打南边的锦州成为了决策关键。

长春比较好打,它已经被围困了5个月,几乎粮尽援绝。但一打长春,引起惊扰,华北的敌人就可能入关增援,东北南部之敌也可能往南逃,达不到集中消灭东北之敌的战略目标。

锦州在东北南端,是与华北相连的枢纽。如果打下锦州,可以切断东北与华北之敌的联系,也可以断绝锦州这一基地对长春、沈阳的空运补给,整个东北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就全部成了瓮中之鳖。

然而要打锦州,附近兵力不足。解放军当时还主要集结在东北北部,要长途奔袭,补给线也长,大规模移动也容易打草惊蛇。

如果来不及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下锦州,那么北部之敌南下,华北之敌北上,就会被南北夹击,腹背受敌。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先打锦州,走一步险棋。

既然是险棋,敌人也就相对麻痹大意,解放军向来不以攻大城市为重心,国民党当局根本没有想到解放军会长途奔袭锦州,而且他们也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因此,国民党对锦州是既不退,也不援,甚至连防御都缺乏周密部署。

当解放军完成包围之后,国民党才大梦方醒,发现了解放军的攻击目标原来是锦州。

9月13日,蒋介石飞到北平,和傅作义商定,由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20个师,组成东进兵团,增援锦州。同时,从沈阳调出主力新一军、新六军等12个师组成西进兵团,由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增援锦州。

蒋介石也在试图决战,既解

专题 大决战

编者按:从内战开始至大决战,国民党军队从人数和装备看往往都占据优势,但从1947年开始却节节溃败,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在东北,共产党多年来一边作战,一边开展土地革命,所到之处,老百姓踊跃参加解放军,部队规模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淮海战役中,共有民工543万人次,运送弹药1460多万斤,粮食9.6亿斤,而国民党军队,则屡屡弹尽粮绝。这就是人民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有人民这个靠山,就能无坚不摧、无往不胜。

锦州之围,又“聚歼顽匪”,他把烟台、天津一带的6个师,也往锦州方向集结。

这时的解放军,性命攸关的一点就是要迅速攻克锦州。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不但会被“包饺子”,还会“中心开花”,几乎不可能全身而退。

毛泽东在10月10日致电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10月10日,国民党东进兵团猛烈攻击通往锦州的必经之地塔山,惨烈的塔山阻击战打响。

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等部,英勇阻击,不惜与敌展开肉搏战,双方均伤亡惨重,但敌人不能越雷池一步。

廖耀湘率领的西进兵团,没有直指锦州,10月11日占领彰武,想从北部切断解放军的补给线。从战术上说这确实是聪明的一着,但这一绕就贻误了战机,解放军一旦攻下锦州,切断补给线就没有意义了。

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对锦州发动总攻,31小时解决了战斗。

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在锦州之役中被俘。他被俘后的领悟,很好地解开了锦州作战的战略意义。

“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

锦州一失,国民党在东北就大势已去。驻守长春的新七军和第十六军,既无力抵抗,又无力逃跑——官兵饿得腿脚肿胀,别说打仗,走路都成问题。

蒋介石飞到沈阳,严令他们南撤,但这么做显然是死路一条,10月19日,他们放下了武器,长春解放。

前往增援锦州的西进兵团也成了解放军的瓮中之鳖,廖耀湘尚未抵达,锦州已失,顿时进退失据。后来决心攻击黑山,占领营口,从海路撤出东北。

东北野战军主力攻下锦州之后,迅速西移,切断了廖耀湘前往沈阳和营口的后路,并对它形成包围。十余万人全部歼灭。11月1日,东北野战军解放沈阳,历时52天,辽沈战役结束,歼灭国民党军47.3万人。

淮海

毛泽东在辽沈战役结束后预估,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

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

三大战役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个通盘考虑,很快,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就开始了。

按照粟裕的建议,淮海战役第一阶段,首先消灭黄百韬兵团。

11月6日,华东野战军主力从山东向南进发,将黄百韬兵团围困于碾庄一带,全歼其5个军共12万人。

粟裕考虑的是,必须把敌军主力悉数歼灭于长江以北,这样以后渡江作战,就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因此第二阶段的目标,就是力争将南线敌主力歼灭在徐州及其周围。

中央军委同意这一建议,电令“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

“甯”,以前都是蒋介石对红军的用词,现在风水轮转了。

接到中央军委指示,中原野战军在11月16日突然行动,攻克了安徽宿县。

宿县是津浦铁路徐州和蚌埠之间的枢纽,解放军占领此处,徐州的刘峙集团就无法通过铁路南逃,也无法获得补给和增援,成为了一个孤岛。

蒋介石调黄维兵团增援徐州,但他不知道,黄维兵团正是解放军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所要消灭的主要目标。

11月23日,解放军对黄维兵团发动攻击,黄维兵团退缩到宿县西南的双堆集一带,被解放军合围。但黄维兵团毕竟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它以攻为守,一时之间难以歼灭。

国民党统帅部为了挽救黄维兵团,决定放弃徐州,令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南下援救,又命令刘峙到蚌埠指挥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北上接应。

形势严峻,有如早前的锦州。

如果挡不住救援之敌,就要被反包围。

12月1日,陈毅打电话给粟裕说:“我们这里正在收拾黄维这个冤家,你们北边要把杜聿明抓住,南边要把李刘看好。”

用刘伯承的话说,这叫嘴吃着—块,筷子夹着一块,眼睛又盯着碗里的一块。

粟裕所部,任务是挡住杜聿明的30万人自徐州南下,他们向西向北向东都可以,就是不能向南,而杜聿明的任务则是奋力向南。

12月4日拂晓,杜聿明集团被全部合围于陈官庄地区,12月6日,试图向西南方向突围的孙元良兵团被全歼。

黄维兵团被困日久,士气消

耗,战斗力逐渐瓦解,许多部队投降,在解放军猛烈攻击下,黄维于12月15日下令突围,但已经无法逃出,黄维被俘,全军覆没。

第三阶段,就是全力收拾杜聿明了。

被困困的杜聿明,手上还有20万人,其中还包括精锐部队第五军,但此时一无能力,胜负一目了然,随时可以歼灭。

不过,此时中央军委却要求华东野战军“围而不打”。

一方面,这样可以拖垮其斗志,减少解放军伤亡,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总攻胜利。

另一方面,另外一个大棋局已经展开了——平津战役。

三大战役之目的,都是在长江以北歼灭敌人主力,现在东北已经全面解放,淮海地区就要完全落入解放军之手,处于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集团,成了惊弓之鸟,中央军委担心如果杜聿明被过快解决,傅作义部就会下定决心从海路南撤。

12月16日,攻击停止。既然“围而不打”,华东野战军就好整以暇,从容休整,而杜聿明部则陷入绝境,在大风大雪中被大批冻死、饿死,许多部队纷纷投降。

1949年1月6日,在解放军合围了平津,傅作义部已经无法南撤之后,华东野战军发动了对杜聿明部的总攻,4天解决战斗,俘虏杜聿明,毙毙邱清泉,全歼杜聿明集团。

淮海战役中,共产党军队60万,国民党军队80万,国民党军队在装备上还占优势,但战事结果是,国民党军队被消灭了55.5万多人。所以毛泽东称赞说:

“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平津

蒋介石则“一时之刺激悲哀,难以自制”。

从内战开始至今,国民党军队从人数和装备看往往都占据优势,但从1947年开始却节节溃败,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此时也是困扰蒋介石的难题。

想内战之初,国民党是何等的信心满满。就连共产党一方也没有预料到形势发展得这么快,据多年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回忆,1946年国民党决裂,是毛泽东最难决断的两个决策之一(另一个是抗美援朝)。

蒋介石还是把责任归咎于军官。

“大家都不研究学术和典范令,更不注意侦察敌情和地形,随便拟定计划,随便颁发命令,而不能缜密研究,切实准备。”

“不用脑筋,不肯研究。无论对于什么问题,总是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至于办事,则更是敷衍表面,不求贯彻。”

“现在我们的大多数军官的脑筋真是睡着了。”

“你们今天作为军长师长的入,如果真正凭自己的学识能力,在外国做一个团长的资格都不够,正因为我们中国一切落后,人才贫乏,所以你们以微薄的才能,担负如此重大的责任。”

“共军……官兵之间,只有职务上的区别,而没有生活上的悬殊。”而“我们多数将领精神疏懈,道德低落”。(下转第六版)

“思想解冻”程度决定发展口径

在一篇名为《这届企业家为何纷纷“早退”？》的文章中,作者以春秋笔法含蓄地道出“企业家早退”的深层原因是反垄断的杀伤力。字节跳动的 CEO、拼多多的创始人、美团的创始人以及蚂蚁金服的控制人,无论是主动离任还是被动出局,无论是高调反击还是吟诗应对,其实都在为政策的不确定性而焦虑。最具典型的是在线教育业务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的“跟谁学”创始人,正在股市暴跌中挣扎,该公司的股价自 1 月底以来已暴跌 88%,财富蒸发近 140 亿美元。事件的起因是管理部门整顿在线教育领域,因此“政策风险是目前的第一大问题。”这批依靠互联网搞模式创新的弄潮儿、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推动者们,因外部环境恶化而告别创新创业的大舞台,这是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随随便便上网搜索“中国企业家”,页面上显示的基本都是“三段论”,如 03 年的热标是《中国富豪为何纷纷落马?》,2013 年的热搜是《温州企业家为何纷纷跑路?》,当下的则是这篇《这届企业家为何纷纷“早退”?》。三个时代、三种状态、一种命运。新世纪初,富豪们落马的主要原因是“官商勾结”,权利与资本走得太近,用吴敬琏的话说是“企业与权力走得太近是不道德的,也是走不远的。”温州企业家跑路的原因是源于形势异常、终于政策翻脸,是金融信贷的联保协议在地下资金链断裂后的“凶相毕露”,冒险与投机带来的结果是风险大于收益,因此,并不能把问题归结到“市场经济的教训”或者“市场对投机行为的纠正”上,本质上还是政策性危机的产物。这一次互联网巨头们的“早退”现象,则是对反垄断的反应。虽然他们跟权力的距离已相对遥远,但他们在市场中展示的威力太大,不能让所有人放心、安心!

2021 年 6 月 10 日,美国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在对苹果、亚马逊、脸书和谷歌等四家公司进行了 16 个问题的调查之后,提交了反垄断法案草案,其内容将迫使科技巨头们改变其商业模式,并抑制大型并购交易活动。尽管在美国 2020 年举办的反垄断听证会上,来自谷歌的皮查伊强调,谷歌在美国聘用了 75000 人,2018 年在美国投资

(上接第五版)

“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身带领的一部的利益,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争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这些确实是事实,但都是技术问题,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些遍布全党、全军的像癌症扩散一样不可遏制的堕落现象呢?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也是国共竞争胜负的根本。

我们来看看淮海战役的运输补给情况就知道了。

天寒地冻之中,供应前方的物资,全靠民工踊跃地肩挑背负。整个战役中,共有民工 543 万人次,运送弹药 1460 多万

颗,粮食 9.6 亿斤。而国民党军队,则屡屡弹尽粮绝。

所以陈毅曾经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蒋介石的忧伤,远远没有结束。

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大部投入淮海战役之后,解放军在平津地区就兵力薄弱,只有华北军区第二、第三两个兵团可以机动。而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指挥下的部队有 60 多万人。

傅作义初期并不太担心,因为在国民党看来,东北野战军经历辽沈战役这样一场恶战之

后,至少要休整 3 个月才能入关。谁知毛泽东急电林彪入关,同时在报章发布消息称林彪仍在沈阳,不知不觉把东北野战军推进到傅作义鼻子底下。

中共中央军委令华北部队先打西面的张家口,切断傅作义退往绥远“老巢”的后路。绥远是傅作义多年经营之地,也是他早期建立抗日根据地,在这一地区他有很大的威望。西边一打,傅作义部队就撤走东边的一部分部队,向西增援。

傅作义一撤部队,东北野战军就迅速经冷口、喜峰口越过长城,向平津急进,突然出现在北平东北的密云一带。

在东北野战军完成部署之前,毛泽东的策略是围而不打、隔而不围,只作战略包围而不作战包围,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

解放军没有强攻,傅作义部也就不需要“迅速决策逃跑”。

12 月下旬,部署完毕。

22 日,华北第二兵团对新保安发动总攻,迅速击溃傅作义的亲信部队——第三十五军 1.9 万余人。

24 日,第三兵团拿下张家口,全歼傅系部队 5.4 万多人。东北野战军则解放了唐山等地,完成了对天津、塘沽的包围,国民党军从海路南撤的可能

见为实;三是创新永远是改变昨天,所以一定会有人反对;四是一旦成功做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方的关注,被用“放大镜”来寻找瑕疵……所以,没有情怀的企业家不但做不大,更是走不远,而能兼顾国家、社会、企业、员工以及个人等五方面利益的企业家更是极品。因此,对这样的群体简单一句“增加包容度”是远远不够的,鼓励创新就要有“立木为信、千金买马骨”的气度与胸怀,国人最看重的“面子”决不能扫落尘埃里。因此,在舆论导向、话题操控、尺度把握以及大众情绪等方面,端持守中是必要的。否则,就是制造敌人。

纵观世界历史,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很难用终极思维、终极模式来定性、定论,而是只能在变化、变异的过程中,双方都不断调整形式、姿态,趋向中间状态。对上纲上线的翻云覆雨,国人闻之色变、苦之久矣。因此,对颠覆性创新,仅仅宽容的态度是不够的,做到既不能伤筋动骨,又要给足面子,在态度与手段上也要大胆创新突破:一是改变对创新行为的评价方式,减少自上而下操作的盲点,尝试通过“海选”定性,让最大多数社会成员参与评价,上下互动,兼顾多维视角,降低片面性与极端性,让各方心服口服;二是评价标准坚持效果导向而非道德导向,避免动辄以道德绑架的方式处理创新影响,主要看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革命总有牺牲,但不能因噎废食;三是提倡处理手段上强调“对事不对人”,不要轻易地否定个人,减少个人形象的跌宕起伏,增加对个体的“赦免”机会;四是克服在“两个极端中随意切换”的积习,它却成了万恶之源。这种极端群众斗争的机构方式,看不出推动历史进步的迹象,却充斥腐朽衰败的气息。

创新创业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其结果如同古代采玉人的九死一生:千人去,百人回,百人回,一人返。1%的成功率已经是极高的比例,特别是在当下,创新创业的勇气与压力非常人所能感受、承担;一是大部分创新不是因为想创新,而是不得不创新;二是创新者是相信就会看见,企业家是让想法变为现实,而那些创新者可能看上去像疯子、骗子,因为对很多人来说,眼见为实;三是创新永远是改变昨天,所以一定会有人反对;四是一旦成功做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方的关注,被用“放大镜”来寻找瑕疵……所以,没有情怀的企业家不但做不大,更是走不远,而能兼顾国家、社会、企业、员工以及个人等五方面利益的企业家更是极品。因此,对这样的群体简单一句“增加包容度”是远远不够的,鼓励创新就要有“立木为信、千金买马骨”的气度与胸怀,国人最看重的“面子”决不能扫落尘埃里。因此,在舆论导向、话题操控、尺度把握以及大众情绪等方面,端持守中是必要的。否则,就是制造敌人。

科学的天启已经来临,理论创新也在进行中,中华大地上出现华为那样的企业,将预示着一个新国运阶段的开启,“思想解冻”程度决定国家发展的口径,找准发展的短板乃国之当务之急!

(摘自 2021 年 6 月 30 日《企业家决策参考》)

性丧失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淮海战役最后一阶段——全歼杜聿明的总攻才在 1 月 6 日最后打响。

而东北野战军也在 1919 年 1 月 14 日总攻天津,29 小时激战后解放天津,全歼守军 13 万多人。

傅作义走投无路,在其女儿、共产党员傅冬菊的率领下,与林彪秘密谈判,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共识。

一座千百年古城免遭战火。1 月 3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入北平城。

(摘自 2021 年第 13 期《南风窗》)

百年变局下反垄断的“要”与“不要”

编者按: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反垄断的历史,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不说,近年美国(尤其是美国)反垄断确实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凡跟中国构成竞争关系或对中国发展形成紧密制约的公司,他们是坚决不会反垄断的,比如对他们全球独霸的各种工业软件公司、阿斯麦光刻机等硬件公司,谁听说过他们要反垄断?相反,只有那

最近一两年来,在中国投资界,垄断和反垄断是一个热门话题。从 2018 年开始,国家层面的反垄断动作层出不穷,反垄断的新闻不断进入公众视野。2020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在国内外受到了广泛关注。而在今年,我们熟悉的大平台公司,都先后被启动反垄断调查程序。

不出意料,这些动作又给外媒抨击中国提供了不少“灵感”,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反垄断”的报道铺天盖地,其对中国反垄断行动的质疑简单总结就是四类:第一类质疑是说中国反垄断会阻碍企业创新。例如纽约时报在报道中说,“(中国)鼓励私营企业和创新的承诺似乎成了空话”。

第二类质疑扣了一项更大的帽子,说反垄断违背了市场经济,企业间不是靠竞争来决定输赢,而是要由政府来决定。

第三类质疑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说中国反垄断是为了打击民营企业。比如路透社的一篇报道中有一句话,说“如果反垄断法只针对对成功的私营科技公司,那将是一场悲剧。”

第四类质疑也流传甚广,说中国反垄断侵犯私有财产,是想把这些大公司收归国家。

的确,在中国,这样的大规模反垄断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企业和投资人在反垄断的大背景下,除了“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外,还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想些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先去真正地理解垄断和反垄断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有过为时一个多世纪的垄断与反垄断历史供我们借鉴,当然最大的案例就是美国。这个,有心人只要去研究一下西方尤其是美国百年来的反垄断史就知道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回过头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尽管在城市化、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面对的困境与二战前的美国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如何让经济增长更具有包容性,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发展的红利,只有这种增长才是可持续的。

2017 年,十九大报告就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二战前的美国正是因为中产阶层的大规模崛起,才开启了后来的美国世纪。中国要解

决好这一问题,同样需要建立这种具有庞大中产群体的“钻石型”社会结构。只有在这种社会结构下,民营资本和民间财富才能受到长期的保护,实现持续增长。

而互联网平台凭借其垄断地位,汇集资本,压低劳工收入,控制消费者生活,最后可能会推动社会结构向金字塔方向发展,而这并不符合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家的长期利益。

因此,我们不难对外媒的质疑做出回应:

首先,数字时代下,垄断对创新的负面影响已经被学术界广泛证明。已经有众多学者指出,数字时代下,由于网络效应、行业集中和平台崛起的存在,竞争格局被彻底改变,新进入者无法挑战巨头的地位,市场中的赢家能够牢牢限制颠覆性创新的出现,市场自我纠正机制的神话就此破灭。因此,反垄断恰恰是在保护创新。

其次,反垄断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包括资本主义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垄断与反垄断的历史。

第三,垄断所带来的扼杀对手、树立壁垒等行为已经威胁到了中小企业的生存,而这正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具活力同时也最为脆弱最需要保护的一部分。

最后,有必要指出,大规模的私有财富本身就不应该是超越国家、甚至能够操纵政治的。这一问题也引起了美国学界广泛反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其《美国真相》一书中指出,经济上的过度不平等将不可避免地将转化为对政治权力的滥用。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赖希在其《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也认为,当全球化的推进和科技的发展让劳动者和精英群体之间的财富分化不断加剧,将会造成民众对于自身制度的信心的瓦解,而这也成为了资本主义当今天面临的最大的威胁。

中国这四十年以来,头部阶层积累财富的规模和速度是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这样的财富积累必然与国家和社会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与之俱生的也必须是相应的各种责任。套用海尔张瑞敏的一句名言,那就是“没有富豪的时代,只有时代的富豪”。

本轮全球反垄断竞争的背後本质上也是一种制度的竞争,平台时代下,政府对企业的反垄断不能仅仅依靠简单的罚款或是拆分这样的“反托拉斯”手段,而是要通过直接干预的手段遏

制垄断资本,这是在美国的制度下很难做到。但是中国可以做到,中国也许不需要把大公司分拆,就能达到反垄断的效果,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

因为资本的无序扩张,20 世纪前 30 年美国险些被搞垮,“大国崛起”差点没能成功。反过来正因为美国当年坚决地制约了资本的权力,美国的中产阶级才真正实现了崛起,从而带动了美国的“大国崛起”。中国现在处在的当口,和当时的美国有相似之处。而因为高度发达的数字经济,制约资本要比 100 年前的美国更为复杂。但只有解决好反垄断问题,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有效制约资本的无序扩张,实现共同富裕,才能使整个社会和谐光明,在 21 世纪,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才能有希望成为大多数人向往的国度。

当然,鉴于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当前反垄断有几点区别美国的地方也需要格外注意:

其一,就是反垄断不能避重就轻。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存在垄断现象,主要表现为行政性垄断以及对天然垄断领域和公共服务部门的不公平管制。

其二,需要区分垄断和垄断竞争。反垄断要针对排斥竞争的垄断行为,不应把技术进步和其他产品差异化现象导致的垄断竞争简单当作垄断,不应主要根据一家企业占有多大的市场份额来判定垄断,而应根据其是否采取了不公平手段排斥市场竞争、是否凭借自身优势地位侵害消费者利益进行判定。此外,一家外向型企业有可能在国内市场上占有大部分市场份额,但在国际市场上仍是竞争者,对此也需要进行区分。

对处在垄断竞争状态的企业,反垄断措施应着眼于纠正其以不公平手段排斥市场竞争的垄断行为,而不是将其整体当作垄断企业限制其发展,更要避免把技术创新、经营模式创新的龙头企业整顿,或在竞争性领域搞国有化。

其三,反垄断同时需要保护创新。举例而言,长期以来,小微企业贷款难是一个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而银行面临的两难问题是如何既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又能控制金融风险、保持良性循环。制约这两者的症结是,传统的大银行很难获得关于小微企业经营状况和信用方面的真实信息,无法放心大胆发放小微信贷。虽然草根型的小型民间金融机构在获取当地客户信息方面比大银行有明显优势,但這些小微银行一直未能发展起来。这与传统审批和监管模式造成的行政垄断有关。

在自然垄断领域,我国建设用地资源至今由地方诸侯独家垄断,土地市场迟迟未能形

成。地方政府追逐高额土地出让收入,缺乏竞争制约,使地房价价不断上涨,普通住房者负担沉重,也压低了居民消费。房地产相关负债率越来越高,金融风险越来越大。2020 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高达 8.4 万亿元,房地产相关贷款高达 67 万亿元,后者占全国银行业贷款总额的 39%,使房地产成为当前金融风险最大的“灰犀牛”。土地资源垄断问题不解决,经济结构再平衡很难实现。

在互联网金融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消费者的信用情况,从而推动了消费信贷。这对改善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状况和为消费者提供信用帮助很有意义。

互联网金融是个新事物。由于在这一领域没有现成的法律法规和成熟的监管模式来规范其行为,有些互联网企业也出现了经营不规范、杠杆率过高、潜在金融风险、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等情况。在消费信贷方面,还出现了给未成年入缺乏理性的消费提供方便等问题。关于互联网企业是否存在数据资源垄断,以及是否会造成个人信息、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也引起了讨论。这些情况是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必须通过建立法律法规,进行有效监管来解决。但一些法律法规和监管模式也需要创新,需开阔眼界,打开思路,深入研究这些新变化及其经济社会综合效果,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完善;旨在既防范风险、消除消极因素,又保护创新,促其健康发展,而不能简单用旧办法、旧思维方式来对待新事物,否则就可能事倍功半,或者使创新受阻。

比如,涉及互联网金融的适用杠杆率,需要对其坏账率、违约率等情况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科学论证;照搬过去的管理制度来讨论。涉及数据资源的社会共享,必须考虑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避免独家长期垄断,但又要注意保护数据收集企业的积极性,使数据资源的开发能够持续进行。过去在技术创方面,有限期的专利保护是各国普遍采用的办法。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同于一般技术创新,未必能简单套用同样办法,但有些思路可以借鉴,用以形成新的管理方式,以兼顾各方利益,达到最优的综合社会效果。

总之,准确有力地方反垄断,和保护创新发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任务。只有做到两者兼顾协调,才能保证未来经济健康发展。

(摘自《投资决策参考》)